



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

『苦难』叙事的精神系谱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文革』叙事研究

黄云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29526

I207.42
72

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

『苦难』叙事的精神系谱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文革』叙事研究



黄云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7.42
72



北航

C16384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叙事的精神系谱 / 黄云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161-2008-8

I. ①苦… II. ①黄…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08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在遥远的海滨

苏 涵

展现在您面前的这套丛书，是由一个居住在遥远海滨的学术群体——集美大学文学学院的教师致力于各自学科的研究，近期所推出的部分学术成果。这套丛书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若干学科方向，分界交融，见仁见智，各立一说，从不同角度体现着这个学术群体所做出的勤劳而智慧的工作。

这套丛书之所以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版，并且冠以“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之名，又是由于一个必须铭记的事实：它是由吕行健先生捐资设立的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基金资助出版的。吕行健先生是集美大学文学学院的校友，毕业后曾经留校工作，后来求学京都，驰骋商海，再将自己所获得的财富回报于母校，支持母校的学术事业，其行其意都令人感佩。

当然，不论是这个学术群体所作出的努力，也不论是吕行健先生对母校学术研究的支持，又都与集美大学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远在1918年，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就在他的家乡——集美创建了集美师范学校，1926年又在集美师范学校设立了国学专门部，我们将此视为集美大学的前身。虽然，那个时候，这“前身”仅仅是师范学校的格局，而非陈嘉庚先生期望的“大学之规模”，但是，却有着卓越的教育理念与学术思想。这些，都绝非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同等学校所可比拟，甚至于值得我们今天具有“大学之规模”的诸多学校管理者借鉴与思考。

在当时的集美学校，校主陈嘉庚先生不仅倾尽自己在海外经营获得

的所有财富，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倾力支撑集美学校的发展，而且倡导以最优厚的待遇聘任优秀教师，支持他们的学术研究。曾先后聘任过诸如国学家钱穆、文学家王鲁彦和汪静之、教育学家朱智贤和罗廷光、哲学家王伯祥和杨筠如、生物学家伍献文、经济学家陈灿、地理学家盛叙功等到校任教。这些或盛名于当时，或享誉于后来的学问大家，在这里教书，在这里做学问，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人才。翻开至今保存完好的当年出版的《集美周刊》，几乎每一期上都刊登当时师生的学术论文、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学术活动与教学活动的报道，可以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感受到朴实而充满灵性的学术研究品格。

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陈嘉庚先生创建并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集美学村里门类众多、规模巨大的学校，逐渐归属于国家所有，并以“大学之规模”迅速发展，才有了今天作为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之一的集美大学，也才有了今天正在蒸蒸日上的集美大学文学院。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的教师欣融相处，切磋砥砺，致力学问，锐意进取，不断提高着自己的学术境界，也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学术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学院已经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一大批颇具影响或崭露头角的优秀学者。他们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国戏曲文学、古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西方小说史、英美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批评、现当代纪实文学与乡土文学、应用语言学、文字学、方言学、文艺学基本理论、民间文艺学等研究方向上都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学术群体有着非常明晰的学术发展理念，那就是：以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研究为主体，为根基，作扎实的学问；以现实文化问题研究为辅翼，为延伸，增强学术研究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可能。在这一学术理念的引导下，我们近年不仅获得了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项目，而且获得了来自于社会的有力支持，正在开展着大方向一致而又丰富多彩的各种系列研究。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决定组织出版全由我们教师自己研究而推出的“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我们计划，这套丛书，每年一辑，每辑可以根据情况编排不同的数量。而每一辑的丛书，既可能是不同作者在不同方向上的撰著，也可能是围绕相同或相近方向，不同作者的各抒己见。但不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它成为一个见证，从一个角度见

证我们学院教师的学术努力，见证我们不断向更高境界前行的足迹。

我们不可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某一个层面上，维持现状，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向自己挑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学术上的真正创造和持续发展。

虽然我们遥居海之一隅，但是，这里不仅有着由陈嘉庚先生亲手创建并在后来日益扩大、愈臻优美的校园，而且有着陈嘉庚先生用一生的言行所体现的伟大精神为我们注入持而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一定能够不断到达我们追求的一个个目标。

从集美大学文学院的楼头望去：近处，红顶高楼林立于蓝天之下，湖泊花园散布于校舍之间，白鹭翔集，群鸟争鸣，正乃自然与人文交融为一的景象；远处，蓝色大海潮涌于鹭岛之外，连通着广阔的台湾海峡，交汇入汹涌的太平洋洋流——有时暖气北上，幻变成风雨晴阴，有时台风遥临，呼唤出万千气象，恰是天地造化之壮观。置身于斯，不生江湖之远的感慨，反而令人常常想起李白的名句：“阳春招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是为序。

2012年6月29日

于集美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导论 “文化大革命”叙事的精神现象学考察	(1)
第一章 “精神”的蛰伏	
——“民族—国家”语境中的“文化大革命”叙事	(17)
第一节 “政治—文学”的书写格局	(17)
第二节 虚幻的“人道”绿洲	(37)
第三节 政治意识形态的“复位”	(50)
第二章 “精神”主体的出场与嬗变	
——“人文”镜像中的“文化大革命”叙事	(68)
第一节 主体意识的文化追溯	(68)
第二节 “人性”意识的“休眠”	(83)
第三节 “语言牢笼”中的“人”	(91)
第三章 精神的突围	
——“自我”与“文化大革命”的对话	(103)
第一节 “他在”世界的回响	(103)
第二节 “我”向“世界”的敞开	(121)
第三节 灵魂的呢喃	(130)
第四章 从“奥斯维辛”到“文化大革命”	(147)
第一节 阿多诺的命题：“奥斯维辛之后”	(147)
第二节 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与“奥斯维辛”的差异	(151)
第三节 精神事件：“文化大革命”与“奥斯维辛”视阈的 融合	(155)

结语	(163)
----------	-------

附录:

“文化大革命”题材小说创作及相关大事年表	(172)
----------------------------	-------

当代文学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及其根源	(199)
--------------------------	-------

红色经典的叙事策略

——“样板戏之现代性”质疑	(204)
---------------------	-------

当代文学史著述的全新尝试

——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213)
----------------------	-------

主要参考书目	(218)
--------------	-------

后记	(228)
----------	-------

导论 “文化大革命”叙事的精神 现象学考察

当自我真正地、实际地在那里时，自我必须如何表现其自身？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有一个自我的现象学说。……你表现为这样，那么你就是这样；你没有表现为那样，那么你事实上就不是那样。

——〔德〕费希特

一

这里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代小说中“文化大革命”叙事的精神历程。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不是指学界通常所讲的“文革文学”，即不是指对产生于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现象及其作品等所作的研究；而是指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至今，当代作家以小说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追忆、反思与想象。从题材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对当代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题材的这批小说作一次整体的研究和梳理，以便从某个侧面来透视当代文学的基本精神走向及作家们所能达到的精神深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研究对象只能大体上确立为：主要以“文化大革命”事件为题材或者以“人”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经历、遭遇等为观照对象的小说文本（尤其是代表性的个案文本）。由此，那些虽然涉及“文化大革命”时代，但并不以这一特定时间段为核心背景或主要叙述对象的作品，就基本未能纳入到研究范围中来。比如京夫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所展示的种种事件，就广泛涵盖了饥饿年代、“文化大革命”动乱及改革开放时期等30多年的时间跨度，“文化大革命”在其

中只是一个必要的部分；又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虽然也涉及诸多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种种遭遇，但在整体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并不是小说所观照的主要对象。另外，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也有不少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如严歌苓的《天浴》等），但出于意识形态与文化视角等方面的差异，这类文本同大陆作家的创作之间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所以，为保持论述本身在结构上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这类文本也被划在研究范围之外。

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具体过程及其在思想史上所具有的意义等问题，都仍然处于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阶段。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曾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①。距离过去的历史越近，人们越容易采用一种情感的而不是理性的方式去看待那段历史；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把自己同那段历史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时，人们往往可以获得反观历史的更好的视角与深度，同时也才能得出一种更贴近历史本相的可靠的结论。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文革的记忆主要保存在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年龄以下的人们来说，文革的记忆已经十分淡漠。即使对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文革记忆也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种基于共同生活经验的集体记忆。相当一部分文革记忆正成为一种与个人经历有关、随着个人生命终结而注定要消亡的个人记忆。历史岁月的无情消逝，正在愈来愈紧迫地向我们提出关于文革集体记忆的问题。”“坚持文革记忆首先就是要坚持历史的当下性，有意义的历史必须是被当下社会以社会正义为目的所集体记忆的历史。”^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② 徐贲：《变化中的文革记忆》，《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

历史研究是如此，文学研究也应当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当代汉语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其中，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占有了相当的数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痛，因而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创伤性”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它已经成为了当代小说家们借以全面而深入地透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形态的最为有利的手段和重要的载体之一。但是，正像历史研究的某些情形那样，身处历史事件之中的人往往并不能看清楚历史的本相；以“文化大革命”为基本题材来展开创作的当代作家和评论家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同样历经了一种由近及远、逐步深入的漫长过程。从70年代末期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及其对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强烈控诉，到80年代日渐冷静的文化反思，乃至90年代至今学界对“人”本身作为“存在者”的诸种问题的不断追问，无不清晰地显示出了作家和批评家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在认识层面的拓展和提升。本书选择“文化大革命”题材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不仅能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全面观照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而且能从整体上展示当代作家精神诉求的基本演变轨迹，以此总结当代汉语小说创作的经验与得失，以求为汉语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照。

王德威认为：“尽管西方历史小说的形式成为五四后作家的范本，中国小说传统视小说为正统历史之延伸、并且将个人生命经验赋予历史意义的倾向，不但未趋式微，反有继长增高的倾向。……尤有甚者，随着国家的政治危机日益紧急，作家更希冀自历史小说中寻求出路，写作出更‘真实’且在意识形态上更激进的作品，以抵抗官方的历史说词。”“当正统历史写作无法受到信赖时，文学（诗）必须担负传达历史真理的责任。”^①“文化大革命”题材的小说创作即可看做是作家们借以反思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无论远近，都与当下人们的具体生存有着密切的

^① 王德威：《当代大陆作家“写”历史：以戴厚英、冯骥才、阿城为例》，《八方文艺丛刊》（第10辑）1988年9月，第145、150页。

联系。但又由于历史事件的本相及其所包含的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原因总是需要经过时间的长期过滤才会逐步显现出来，所以才导致了人们对于历史在认识上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在当代“文化大革命”题材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得极其明显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差异，才有了作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开拓其想象空间的可能性；同时，也正是因为作家们经历了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精神演进的历程，才使得他们的想象与叙事有了逐步拓展与深入的机会。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当下对于历史的认识永远都将处在“未完成”的状态，那么，作家们对于历史的想象与叙事也将永远不会有一个终极的尽头，任何一种新的发现和创造都将潜存着精神自身的有待于进一步开掘的巨大可能性。

当然，“文学”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小小说所叙述的诸多事件也同样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历史真实本身的复制。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想象，按照叙事学的一般理论来看，一切文本都只是一种“叙事”，而一切叙事都将不可避免地同事实本身拉开距离，即使最为客观的叙事也不可能与所叙述的对象画上绝对的等号。这一点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评价“文化大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只是在对作为评价对象的这一类“文学文本”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蕴涵作出某种价值判断，而不是在对作为“历史”的“文化大革命”作某种结论；我们是在试图寻找作家本身的精神价值取向和文学所显示出来的精神意蕴，而不是在通过文学去寻求对“文化大革命”现象的历史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小说是一类极为特殊的叙事文本，它既包含着丰厚的“历史”意蕴，同时又蕴藏着文学所特有的“审美”诉求与民族精神的因子。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一类文本放置在这样三个层面上加以考察：历史学层面、美学层面与精神现象学层面。历史学层面上的考察侧重于寻找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并从中寻找出历史本相在文学文本中的投影，以便为人们进一步认识这段特定的历史确立起某种必要的参照和尺度；美学层面的考察则着力于发现此类文本中所蕴涵的“美”的因素，这类考察主要将文本看做“美”的既定载体，以求从中发现“美”的存在及其规律。历史学与美学的考察视角都有其明显的价值意义，它们在其各自的范畴内都已经建立起

了相对完备的“知识学”体系，而“精神现象学”层面的考察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知识学”体系的完善与补充。精神现象学侧重研究精神形态的自我显现过程，它以“精神”作为其特定的考察对象，以此揭示出“精神”本身逐次生成的整个过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Dialektik）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全从意识辩证进展的过程去指出达到哲学观点的必然性”^①。

黑格尔所描述的“精神现象”可大体划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哲学或绝对知识）这样的逐次递进的五个阶段。^②事实上，如果我们撇开其“绝对理念”之类的先验论前提来看，黑格尔的划分非常准确地描绘出了“精神生成”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如邓晓芒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精神现象学按黑格尔自己的说法，叫做‘意识的经验科学’，是专门谈意识的。在这里，意识是以‘经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里的‘经验’（Erfahrung）有‘经历’之意，也就是说，意识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③“意识”从“感性的确定性”出发，在与实存现象的对象性观照中将“自我”从其对象物中剥离出来，进而形成“自我意识”；在经过对“感性”的“自我意识”的辩证否定之后，确立起独立的“理性”基础，并以此为起点形成其完整的“精神”形态，最终达到对于“绝对精神”（哲学或绝对知识）的全部认识。这一过程也可以描述为一种“有→无→变”的三段式进展：“‘有’便是第一个直接的确定性，‘无’则是这个确定性的打破；有的确定性是现成的，不需要去寻找，但它自身包含着无、否定；而这个无、否定又包含着自己的否定，于是过渡到‘变’，即一个进一步被规定、被确定了有；只是在‘变’中，而不是在有或无中，才第一次出现了

①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3页。这里的“精神现象学”分析主要依据的是黑格尔所强调的对于“经验世界”的精神现象的透视，所以应当区别于胡塞尔或海德格尔所倡导的那种以“先验存有”为前提的现象学观念及其方法。

②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寻言》（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页。

③ 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绪论》，《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

‘真理’一词。”^① 黑格尔对于“精神生成”过程的描述对于我们对自身精神形态的认识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从这一立足点出发，可以看到，当作为“历史”事实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文学”文本之中时，它就已经在“人”的意识的参与作用下演变成为了“人”的一种特定的精神现象，而体现在文学文本中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根源的持续追问，则充分显示出了“精神”本身逐步生成与辩证发展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们将黑格尔的描述具体纳入对于“文化大革命”叙事的文本分析，即由文本自身通过其叙述所展示出来的精神现象入手，去剖析和比照当代“文化大革命”小说在不同阶段所显示的精神演变历程的话，则不难发现，这一精神历程正与黑格尔的论述有着某种潜在的互证关系。依据精神现象学的有关理论，我们也可以将当代汉语小说中“文化大革命”叙事的“精神”历程大体划分为“精神的蛰伏”、“精神的自立”和“精神的突围”三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以此来剖析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特质及其反思“文化大革命”所达到的精神深度。

首先，所谓“精神的蛰伏”，是指“精神”尚处于感性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初级阶段。80年代前期以感伤与反思为基本特征的小说中，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叙事仍旧是文学书写的自明的前提，此一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叙事实际上显示出的只是对于50—6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复归”，其基本叙事格局是“政治—文学”的二元对应。也正是由于这个时期“民族—国家”主体全面压制了人的“精神”主体的真正确立，才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强烈渴望。“政治的人”并非单纯是指其拥有了某种实施其政治行为的权利，而是指其拥有对“政治”展开“思想”的能力。但这种“思想”能力的首要前提是必须使人真正拥有“非依附性”的独立“精神”主体的地位。其次，“精神的自立”的重要标志就是“理性”的确立，“理性”首先要对“意识和自我意识”作出否定，并对“理性”本身给予质疑和反思，借此才能达到“精神”的自觉。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寻根实际上正是在为“精神”主体寻找某种能使其得以立足的坚实

^①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的根基，从“政治的人”转换为“文化的人”，其所显示的是“意识”向“自我意识”及初步的“理性”的过渡。而“知青”作家的创作虽然相对避免了“民族—国家”主体对于“人”的精神主体的压制，但由于未能看到确立“人”的主体的过程中“精神生成”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主体的精神最终停留在了暴力肆虐的“非理性”层次上。人的“精神”主体的确立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确立主体“话语”的问题。在“精神”寻求“自立”的整个过程中，作为强势话语而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同“人”的独立“精神”话语之间一直处于某种胶着状态，所以，如何将“人”的独立精神话语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来的努力，也可以看做是当代文学之精神诉求所无法回避的难题。最后，“精神”的确立必须通过使“精神”从一切貌似“精神”的假象中“突围”出来才能得以实现。“精神”的“自觉”本身就包含了深刻的“自否定”特征，一方面，它以其完全区别于“意识—自我意识”及一般“理性”的全新的面貌宣告了“精神”的诞生；而另一方面，它又以仿佛是回到了起点的形式，开始了对自身在每个阶段的不同形态的逐层检视。“精神”在此就被转换成了一个“精神”之外的“他者”，在与“他者”的对象化观照中，“精神”最终才完成了对于自身的真正“超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作家们或者在不断撕裂“精神”本身的各种伪装，或者从对精神自身的“自我”反观中去力求获得牢固的“精神”主体地位，这一切所显示的正是“精神”对自身的“自觉”。评判“精神”的“尺度”不可能来自于感性的“现实”，而只可能来自于“精神”本身。“人”是唯一有能力“思想”的动物，正是由于有了“思想”，“人”才构建起了区别于“现实”的另一种“可能”的精神空间，也正是这个不断“思想着”的“精神”空间，才为评判“精神”自身及感性“现实”中的一切提供了可靠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的努力无疑显示出了“精神现象”的真正“本质”，它同时也为我们反观“文化大革命”，乃至反观我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有了对“精神”历程的剖析作为前提，当我们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定位问题时，我们才会从诸如“奥斯维辛之后”等之类的命题所提供的全新的参照中，去进一步深入反思“文化大革命”。不是把“文化大革命”和“奥斯维辛”简单地等同起

来,而是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即重新回到“精神现象”的视阈中去,以寻求它们作为人类所共有的“精神事件”的某种“同构”特征。将我们自身真正从感性的现实和历史中抽离出来,以便对“文化大革命”达到一种“哲学视野”上的深刻认识。

从80年代之初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与剥离(“感性确定性”与“意识”),到“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步确立(“自我意识”向“理性”的过渡),再到将“文化大革命”纳入到同“奥斯维辛”具有同等价值的哲学视野中去加以观照(“精神”及其超越),这一过程所显示的正是黑格尔所概括的“精神生成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哲学视野”可以看做是精神现象学的最高阶段,精神现象应当“被视为向真知识发展中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一系列的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地或完全地经历了它自己以后,就认识到它自己的自在”。^①所以,对于这一过程中各个环节所显示出来的精神现象的深入剖析,将是我们展开论述的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对于“精神”的各个阶段不同形态的划分只是我们得以展开论述的基本依据和相对的参照,而不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任何一种“精神现象”都可能包括了其自有的复杂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将之简单而绝对地对应于某一种固定的“精神模式”,精神发展阶段的划分毕竟是相对的。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剖析“文化大革命”题材小说的最终目的,仍旧是希望从更高的“形而上”的哲学层次上去反观“文化大革命”及其对当代汉语文学所产生的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二

截至目前,有关“文化大革命”题材小说研究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55页。

了，但这类研究大多是以对单篇作品或者某一类及某一特定时期的作品的解读为主，其基本可以归结为“历史—美学”层面的研究、“叙事—形式”分析及“现代性”视角这样的三种研究模式。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历史—美学”层面上的研究应当属于多数，这一类研究或者将重心放在对于文学所揭示的历史—现实的本质的考察上，或者强调文学自身所具有的审美功能及其对现实的审美超越等。比如众多学者对新时期一度涌现的“伤痕”、“反思”等文学热潮的重新评价就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批评视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为适应国人情绪宣泄和政治批判的需要，“伤痕文学”应运而生。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伤痕”文学的出现意味着当代中国结束了“非人”文学的历史。同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也顺应了“伤痕”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功能而给予了其充分的肯定。伤痕小说在艺术上虽然比较粗糙、直露，但它仍旧提供了大量可以对某种荒谬的历史加以阐释的信息。继之而起的“反思小说”则把沉重的思考带进了文学，它恢复了文学质疑和批判生活的功能。反思文学由于大多浸透了血泪人生的感悟，反映的又是苦难已被超越的审美心理，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的悲剧力量中隐含的历史批判，也给了从集体迷误中走出来的人们以思想启迪。^①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主要是前17年）的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也正是现代中国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体抗争精神，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全面消解了前30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本相。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巨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②

① 毕光明：《从“伤痕”到“反思”——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一》，《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② 宋剑华：《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